



张 弛

我国古代 家庭教育浅谈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浅谈

张弛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浅谈

张 弛

※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.25 字数：60千 插页2

1984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100

统一书号：7157·418 定价：0.32元

写在前面的话

家庭，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。生儿育女，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。家庭既是儿女成长发育的摇篮，又是培养未来人才的第一个学校。这个学校的第一任老师，理所当然地是父母了。因为孩子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，都离不开父母。孩子年幼时和父母朝夕相处，进入青少年时期，大都仍旧生活在父母身边。就是走向社会和工作岗位，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之后，依然和父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经常的接触。这种特殊的血缘关系和感情决定了孩子往往天然地依从父母，并在无形中受到父母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。家庭教育正确与否，对孩子后来的性格、品德和习惯兴趣的形成，对他们长大后能否成材，起着十分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教育子女是父母的天职，家庭教育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。

有的家长特别是一些年青的父母说，我也知道家庭教育重要，可苦于教子无方。

“方”从何来？无非两条途径：一是从直接的亲身实践中摸索总结，一是学习间接的经验。这些经验，可以从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学，向书本和别人请教，也可以借鉴前人的。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的传统美德。历史上许多

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和有识之士，在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家庭教育经验，留下了不少“家书”、“家戒”、“家训”、“家法”等方面的宝贵资料，在各个历史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家庭教育的楷模。这些家庭教育的榜样，尽管他们的思想都打着当时社会和阶级的烙印，但他们教育子女的经验，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。把散见于浩瀚史海中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言论、事例采摘出来，用条线连穿到一起，使我们今天的父母能从中受点有益的启示，悟出点教育子女的道理，便是整理这本《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浅谈》的目的。

本小册子所引用的史料，大都是在翻阅史书过程中陆续摘录的，也有一些是从见诸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中借引的，一般都有据可依，力求忠于史实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，无论是封建帝王将相也好，社会名人志士也罢，对于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功过是非，则应另当别论。这里所摄取的只是他们在家庭教育方面的言行和经验教训，单就这一侧面，也收集得很不完全。加之个人的学识浅薄贫乏，接触的史料有限，因此谬误和漏洞肯定不少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教。

作 者

一九八三年八月

目 录

希望与教育.....	1
教育子女宜早.....	10
严是爱，宠是害.....	18
当为子女计深远.....	27
言教和身教.....	36
择善而从.....	41
扬长避短，因势利导.....	49
崇德不崇位.....	54
以俭朴为美.....	63
子不以父贵.....	71
父不为子隐.....	79
忍所私以行大义.....	86
给子女留下什么.....	92

希望与教育

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，古往今来，做父母的没有不寄希望于自己的后代的。“望子成龙”这句话，可以说是形象地概括了天下“父母心”。

“龙”，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，一直被人们看作是高贵的象征，所以，历代的封建帝王都自称是“真龙天子”。在以等级制度为重要特征的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，人们望子成龙，就是希望孩子能走上“仕途”，“金榜题名，蟒袍加身”，成为达官贵人，以此来“光宗耀祖”。因为在那种时代里，一旦跳进“龙门”，有了官位，一切荣华富贵就会跟着而来。反过来说，你纵然有真才实学，有天大本事，无官位也是受人歧视的。战国时期有个叫苏秦的人，“十年寒窗，九载熬油”，读了点书，父母便打发他出去谋生路，找“官”当。没料想跑到秦国后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十分狼狈地跑回洛阳老家。一副可怜相：“羸滕履蹻，负书担橐，形容枯槁，面目黎黑，状有愧色”。这时，按说应该得到家庭的温暖与关怀吧，可是乡邻四舍和家里人见他没当上官，谁也瞧不起。回到家里，“妻不下紵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为言”（妻子见了他不下织布机，嫂子也不给他做饭吃，父母连话也不跟他说）。苏秦叹息说：“妻子不把

我当丈夫，嫂子不把我当小叔，父母亲不把我当儿子，都是因为我这回没当上官啊！”后来他“引锥自刺其股”，昼夜发愤攻读，学识有了长进，便又一次出门，翻弄三寸不烂之舌，游说赵王，取得了相印，抖起来了。再回老家洛阳时，你看那个威风劲：“父母闻之，清宫除道，张乐设饮，郊迎三十里；妻侧目而视，侧耳而听；嫂蛇行匍伏，四拜自跪而谢……”^①从苏秦的父母对待儿子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，就不难看出古人“望子成龙”的思想所带的明显的阶级烙印。当然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责怪和苛求古人，人们的思想总是受着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制度的局限。

望子成龙，人之常情。但是，光有“望子”之心，能不能“望”出“龙”来，纵观历史，确很少见。古人的成功经验是，“望”不如“教”。这里不妨以三国时几个有名的人物为例来说明望不如教的道理。吴主孙权，也可以算封建地主阶级中的“一条龙”吧。史书记载，孙权父兄早亡，十八岁开始执政，称雄江东，历时五十余年，很有点乱世治国之才，被称为“聪明仁智雄略之主”。连他的强劲敌手，运筹帷幄，挥鞭宇内的魏武曹操也对他有几分敬慕，发出了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的感叹。孙权之所以能“成龙”，恐怕与母亲吴氏夫人的教育分不开。这位吴氏很有点见识，在那种兵荒马乱、诸侯混战的世道里，没有忘记让儿子坚持读书习武。她督促儿子读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古代经典著作，还经常给儿子讲治国安邦的学问，以后又帮孙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政治形势，任贤用将，“兄事”周瑜，对东吴政权的巩固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。孙权的哥哥孙策也是个比较有才干的人，曾在袁术部下为将，

率军渡江，削平当地割据势力，占据江东六郡，创立了孙氏政权。袁术曾叹息说：“使术有子如孙郎，死复何恨！”②

曹操盼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孙权那样的人，袁术盼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孙策那样的人。看来，在“望子成龙”这一点上，二人是一样的心情，并都以孙家弟兄为标准。可是，后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。曹操的儿子曹丕、曹植及孙子曹芳都各有所建树，尤擅长诗文，祖孙三代四人同为伟大的文学家，以“文学世家”名垂青史。而袁术的后代，没有听说有什么出息的。原因何在呢？就是因为曹操不把对儿子的“成龙”仅仅停留在“望”字上，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，使自己的儿子无功而受禄，无才而受位。无德而受尊，而是严格要求，积极采取措施，下功夫教育培养他们成材。曹操在百忙之中，不忘教子读书习武，并注意了解儿子的思想感情和兴趣，因势利导，精心培育。他特地颁布《诸儿令》说：“你们在年幼的时候，我虽都喜爱，但只有长大有真才实学的，我才重用，这并不是吓唬你们，而是实在话，我不但对臣属没有偏心，就是对自己的亲骨肉也不想有任何偏袒。”他的长子曹彰“好为将”，受命北征时，曹操严肃地对他说：“居家为父子，受事为君臣，动以王法从事，尔其戒之！”不许儿子依仗自己的权势放纵马虎，贻误军机。他的次子曹丕，本为太子，但曹操不叫曹丕成天在宫廷中生活，而是把他带在身边，让他生活在征战的军营中，经受战火的锻炼，增长治国治军的才干。对喜欢文学的三子曹植，曹操则着重教他吟诗作赋。③而袁术呢，却是个听天由命的人，他听信了“命里没有莫强求”这样的话，对儿子们有“望”而无教，只把期望停留在“称羨”、“叹息”上，而没有象吴氏夫

人和曹操那样，采取具体的教育措施，那他的儿子当然也不会“如孙郎”了。

在教子问题上，有人相信那种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儿会打洞”的宿命论和血统论观点，认为只要生活在好的家庭环境里，不“教”也能成“龙”。他们说，自古以来，将门出虎子。其实，能不能出“虎子”，关键不在于是否“将门”，而在于教育。南朝宋高祖刘裕，被后人称为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的英雄，就出身“寒门”，年轻时种过庄稼，打过鱼。^④出身“将门”，不教也难成“武将”；出身“书香诗礼之家”的，靠其自然发展也难成“文才”。东晋时的陶渊明，是个有名的田园诗人。按说，他的孩子生活这样的诗礼之家，应是有所作为的。可恰恰相反，“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”^⑤，全是些贪吃贪玩的平庸之辈。据史书记载，陶渊明三十五岁时才有了第一个儿子舒俨，一开始他是抱有很大希望的。他在《命子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卜云嘉日，占亦良时，名汝曰俨，字汝求思。温恭朝夕，念兹在兹。尚想孔伋，庶其企而。”^⑥诗人望子成龙，连给孩子起名和字也是费了一番心血的。俨，恭敬也。这是取自《礼记·曲礼》中的“毋不敬，俨惹思”，意思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朝夕温和恭敬，肯于学习和探索，成为象孔子的孙子孔伋那样的人。可是，不知是诗人忙得顾不上教育呢还是教育方法不当，他的五个儿子长大后，没有一个成器的。这可以用陶渊明五十一岁时写的《责子》诗为证：“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，懒惰放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

物。”^⑦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儿子们的失望、焦虑和愤怒之情。但是，光责骂是无济于事的，抱着一种听天由命，放任自流，不再想法教育，只顾以酒解愁，“且进杯中物”的消极态度，那就更不对了。

按照“天命论”的观点，封建帝王是所谓的“真龙天子”。那不用说，他的子孙后代都是当然的“龙种”了。可是，统治阶级中有见识的人物，也懂得即使“龙子龙孙”也有个教育成材的问题，否则，是成不了“龙”，继承不了祖业，保不住江山的。被称为“一代英主”的唐太宗李世民，就懂这个道理。他说：“古来子弟生于深宫，得其成人，无不骄逸，是以倾覆相踵，少能自济。”为此，他把教育太子诸王看作是“最当今日之急”。当他选定第九个儿子李治为太子后，一方面以当时的开国名臣房玄龄、长孙无忌和肖瑋为太子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负责对太子进行授课训导，一方面自己亲自教诲。当父子俩在一起吃饭时，他就问儿子饭是从哪里来的，叮嘱他不要忘记老百姓种庄稼的艰难，当知粮食来之不易。看太子乘马时，他打比方说：“你如果能体会到马的疲劳，而不使马跑得精疲力尽，那才能常骑。”和太子一块乘船游览时，他就给他讲“水”和“船”的关系，说：“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黎民百姓好比是水，君主帝王好比是船。”^⑧很显然，李世民是以物比喻，给儿子讲明要巩固统治地位，就要对人民实行“让步”，不能逼压太甚的道理。为了教子成“龙”，唐太宗还于贞观七年（公元633年）诏令魏征收集历代帝王子弟成败得失的事例，编成《自古诸侯王善恶录》，并亲自作序，分送给他的所有儿子，要他们“置于左右，用为立身之本”。以后，贞观二十二年

(公元648年)，他又亲自写出《帝范》十二篇，内容包括怎么“知礼”、“求贤”、“审官”、“纳谏”，如何“去谗”、“赏罚”以及“崇文”、“阅武”等方面，让太子照着办。还对儿子说：“我当皇帝，凭的汗马功劳，功大益多，所以虽然有缺点，还不至于使人怨恨，基本上能稳住江山。你没有我这样的开国之功，继承王位后，只要竭力为善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民，国家还可以安定。如果只贪图荣华富贵，一味骄奢淫逸，恐怕连命也难保了。要记住：创业难，守住江山也不容易。千万要谨慎。”^⑨

出身门第，不能决定一个人能否“成龙”。那个人的天资呢？有人说，我那孩子生来聪明早慧，不用多操心也能成材。对此，古人也有经验教训。宋朝有个方仲永，明末有个夏完淳，都在当时被称为“神童”。可是，夏完淳的父母并不满足于孩子的“早熟”，从不放松教育，使夏完淳不断进步，五岁知五经，九岁善词赋古文，十五岁从军，屡建战功，后以身殉国，成为当时的一员名将。而北宋的方仲永呢？虽然五岁就能写诗，达到“指物作诗立就，其文理皆有可观者”^⑩的水平，可到了十二三岁，作诗却不如以前了，再过几年，就象一个平常的人了。到了二十岁，居然文思枯竭，根本不会写诗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原来方仲永的父亲是个唯利是图、见钱眼红的财迷。当儿子出名后，猎奇、慕名者接踵而来，连当时赫赫有名的宰相王安石也两次去寻访。他一看有利可图，就成天让儿子献诗题名应酬来访者，自己从中赚钱，而使孩子失去接受教育和学习提高的机会，时间一长，就象堵塞了源泉的井水一样，怎能不枯竭呢？为此，王安石写了《伤仲永》^⑪一文，告诫后人，即使象仲永这样

天资聪明的孩子，放松教育也是成不了大器的。王安石这个观点，为后来的许多有识之士所接受。清朝雍正年间曾名重一时的学者彭端淑，在他写的《为学一首示子侄》这封信中，就谈到聪明和愚笨的辩证关系。他认为，即使天资很聪明敏捷的人，不抓紧教育和学习，就可能变得愚蠢；天资愚钝，才能平庸的人，只要好好学习，也会变聪明的。他还以四川两个和尚朝南海的故事为例，说明“是故聪与敏，可恃而不可恃也”的道理，告诫自己的孩子和侄儿们要从小立志，勤苦学习，长大才会有出息。^⑫

光有“望子成龙”之心而失教不行，依靠优越的家庭条件或孩子本身的禀性天赋，任其自然发展也不行，正确的态度应当是“望”中有“教”，“望”“教”结合，以“教”达“望”。在这方面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的成长。戚继光出身世代武将之家，他的父亲名叫戚景通，曾任登州卫的指挥僉事，勤奋好学，精通兵法，武艺过人，治军严明，为人正直。他五十六岁，才有儿子。恰巧，孩子出世的第二天，天气晴朗，初升的太阳泛着红光霞彩。暮年得子的戚景通，站在门口，望着瑰丽的大自然美景，浮想联翩，把自己的希望、儿子的前途和晨光联系起来，盼望孩子将来能成为一个光辉的人物，于是，给取名叫“继光”^⑬。当然，这位戚景通懂得，儿子将来能不能成材，光靠取个好名字是无济于事的，必须寓希望于教育之中。他对儿子十分钟爱，可并不娇惯。有一次，外祖父家给小外孙送来一双很高级的锦丝鞋子，继光穿上走过庭前，被父亲看见了，父亲立刻命令他脱下来，教训说，小小年纪穿这样上等的鞋子，长大后就会追求更高级的衣着，养成奢

侈的习惯。还有一次，工匠们对十二岁的戚继光说：“公子家是将门，可以安十二扇门户，四扇门户是一般普通人家安设的。”继光一听，跑去请求父亲增安八扇门，被戚景通严厉地训斥了一顿，他对儿子说，屋不漏雨，门能进能出就行，为什么一定要讲究排场呢？要好好造就自己，将来才能保国守家，否则，连四扇门户也保不住！戚景通在生活上对儿子不娇宠，在学习上要求更严格，经常给儿子讲“笃志读书”，发奋成材的道理，每次外出回来，都要抽出时间检查儿子的学业进展情况。发现儿子对军事有兴趣，就经常教他练武，讲解军事常识，教育他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精忠报国，守疆安民的军人。这种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戚继光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品德、强烈的上进心和吃苦耐劳的作风，奠定了一定的军事素养，所以，在十七岁时就能接替因病退职的父亲，独立挑起了登州卫指挥僉事的重担，带领士兵，南北转战，抵御外敌，为国为民，屡建功勋。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都是横戈马上行”。成为年青有为的爱国将领。^①

【注】

①原出自《战国策·秦策》。引自《古文观止》（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）第128—132页。

②见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等。

③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；《曹操集译注》（中华书局1979年版）。

④见范文澜：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册第467页。

⑤⑥⑦见《陶渊明集》（中华书局1979年版）第28页，第106页。

⑧⑨见《纲鉴易知录》（中华书局1960年校点本）卷四十四第1172页；卷四十五第1182页。

⑩⑪见《历代散文选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）第287页。

⑫见《历代散文选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）第397页。

⑬据《武备全书·皇明将略》记：“是日，日华五色，故孝廉名之曰继光。”

⑭据谢永仁等《戚继光》一书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）。

教育子女宜早

“望”不如“教”，教育子女宜早。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，这在我国也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。

为什么说教子宜早呢？《颜氏家训》的作者，北齐时期的学者颜之推说：“人生幼小，精神专利，长成以后，思想散逸”，因此，对他们“固须早教，勿失机也”。^①这位颜老先生的话不是随便说的，而是从切身经历中总结出的经验之谈。他出生于东晋官宦世家，家庭教育本来是很严的，可由于早年丧父，只得靠哥哥抚养。他的哥哥有爱弟之心，但缺少教育之法，“有仁无威，导示不切”，以致使颜之推在少年之时，受到社会上不良习气的熏染，“肆欲轻言，不修边幅”，^②滋长了不少坏毛病。到了十八九岁，才渐渐觉悟，以后“每当心共口敌，性与时竞，夜觉晓非，今悔昨失，自怜无教，以至于斯”^③，深深感到是从小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造成的。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和观察历史，觉得孔夫子讲的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”和俗话说的“教儿婴孩”是很有道理的^④，明确了教育子女必须从小抓起，早教比晚教效果好。为此，他写了一本二十卷的《颜氏家训》，用以教育子孙。

颜之推的这种早教观点，为后代许多著名学者所推崇和

发展。北宋中期的程颐提出了“以豫为先”的原则，主张在孩子幼小的时候，就通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来为以后的成人奠定良好的基础。宋代的另一名教育家张载说：“故善养其子者，当其婴孩，鞠之使得所养，令其和气，乃至长而性美，教之示以好恶而有常。”^⑤南宋时期的朱熹也主张早期教育，他说：“必使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，欲其习与智长，化与心成，而无扞格不胜之患。”^⑥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来，就是对孩子务必从小教育，使其养成好的品行和习惯，德、智、体同时全面发展，否则，当他长大成人，养成了坏的习性后，就难以改变了。朱熹还打比方说：父母教子犹如雨露阳光滋润草木。草木刚一萌芽，就逢春雨细润，那肯定生长迅速。对孩子教育早而及时，就容易见成效。明末清初的著名哲学家王船山在《俟解》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观点。他认为“养其习于童蒙，则作圣之基于此。人不幸而失教，陷于恶习，耳所闻者非人之言，目所见者非人之事，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，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，外洗髓伐毛，必不能胜。”^⑦这位王老学究瞧不起“里巷村落”的偏见显然是错误的，但他关于“养其习于童蒙”的见解却是很有说服力的。他告诫人们，一个人在小时候所养成的性格、习惯，往往会影响到整个一生。不抓紧早期教育，任其自然发展，一旦沾染上了坏俗恶习，长大了再想克服，就得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。

那么，“早”到什么程度呢？也就是说，早期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好。古代学者虽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论述，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

有的人主张在婴儿出生之前，甚至在选择配偶之时，就